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撰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 撰

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2版.—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2010.6)
ISBN 978-7-5325-2329-0

I. 藝… II. ①歐…②汪… III. 百科全書—中國—唐代
IV. Z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5799 號

藝 文 類 聚

(附索引)

(精裝二冊)

[唐]歐陽詢 撰

汪紹楹 校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交大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0.25 插頁 11 字數 1,368,000

(1965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新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版 2010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數:4,301—5,600

ISBN 978-7-5325-2329-0

Z·333 定價:180.00 元

藝文類聚卷第八

歐陽

詢

撰

山部下

虎丘山

蒜山

石帆山

石鼓山

石門山

太平山

岷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上

惣載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漢水

洛水

虎丘山

虎丘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吳越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山王珣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撻土冢池四周水深丈餘擲三重傾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鳬鴈扁諸之劍魚三千腸在焉葬之巨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 三珣虎山記曰山大勢四面周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踐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張正見從永陽王遊虎丘山詩曰滄波壯鬱島洛邑鎮崇崇若 茲山屢崑嶠擅水鄉地靈侔少室塗艱像太行重巖標虎據九曲 峻羊腸溜深澗無底風幽谷自涼寶沉餘玉氣劍隱絕星光白雲多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百穀部 穀 禾 稻 稌 黍 粟 豆 麻 麥

布帛部 素 錦 綃 綾 羅 布

穀

爾雅曰中有岱岳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爲饑仍饑爲稔言太山有魚鹽
連歲不熟皆周官曰楊州荊州宜稻豫州宜種麥青州宜稻麥兗州宜三種
雍州宜黍稷幽州三種冀州宜黍稷并州宜五種五種黍稷苽麥太宰九
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黍稷稻粱禮記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謂以上辛郊天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牛薦寢廟稷
之餼始於命百官始收斂秋伏有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噍二穀不升曰饑
三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有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
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五

書影二：明嘉靖初年天水胡纘宗在蘇州刊本

前言

自《皇覽》而下，歷代的封建王朝曾經屢次運用政府的力量組織人力，搜檢皇家藏書，編纂成不少的大型類書。這些類書匯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加以分門排比，其性質約略相等於現代的百科全書和資料類編。它們在當時起着傳授知識、臨文備查的作用。對後世讀者來說，由於它們集中而又類別地保存了歷代繁富的文獻資料，因而具有了較為可貴的參考價值，為學術研究者所重視和使用。然而這些古類書也多有散佚，在遺留下來的幾部規模較大的類書中，保存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的，《藝文類聚》是頗為重要的一種。

《藝文類聚》是唐代開國初年由高祖李淵下令編修的。下詔的年份，據《唐書》七十三《令狐德棻傳》的記載為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唐書》一八九上《儒學·歐陽詢傳》記為武德七年（六二四）詔修，乃是誤以成書上奏之年為詔令修書之年。受詔參與編修的共十餘人，《唐書》一八八《孝友·趙弘智傳》云：「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今能考知姓名的有給事中歐陽詢、秘書丞令狐德棻、侍中陳叔達、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趙弘智、齊王文學袁朗等人。對於領修人的問題，《四庫全書總目》以存疑的口吻說：「殆以詢董其成，故相傳但署詢名歟？」關於這一點，其實是可以完全確定的，因為：（一）全書的序文

由歐陽詢撰寫；（二）從《唐書·經籍志》它是以毋嬰的《古今書錄》為據的。以來的本書作者著錄，向來但具詢名；（三）據《唐會要》，本書由詢奏上，就更可以明確了。

李淵原是個大官僚地主，他利用當時農民起義軍已經動搖了楊氏統治基礎的形勢，發兵反隋，趁機攫取了政權，而後又逐步消滅了各地的農民軍和割據勢力，建立起一個新的封建王朝。然而由於隋末農民起義所顯示的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迫使新王朝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推行和改革均田制、租庸調法等，以冀緩解矛盾，安定秩序，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生產有了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唐帝國才日趨強盛。李淵為了要顯示新王朝的彬彬之盛，就有了大規模官修群書之舉。在詔修《藝文類聚》的那年，同時詔修唐前列代史。自魏迄陳、隋。編修《類聚》的諸人，也有不少被任命兼修史書的工作，如歐陽詢修《陳史》，陳叔達、令狐德棻修《周史》，裴矩修《齊史》。見《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這也可以說明參加編修《藝文類聚》的，都是當時文壇的「一時之選」，而他們兼領史館工作，對充分地掌握修撰類書的原材料也多一有利條件。唐前列代史的工作，《魏史》後停修。直到太宗貞觀十年（六三六）才畢其全功，而《類聚》却迅速地完成了。

《藝文類聚》以三年的時間編成，在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六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奏上。見《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按，「修撰」一類所繫歲月，都是官書修成後的奏呈年月；《藝文類聚》條并確言是年月日「上之」，更無

疑義。以此證《唐書》令狐本傳所記詔修年份為確，而《儒學·歐陽詢傳》有誤。據《唐書·儒學·歐陽詢傳》和《唐會要》的記載，都能確定本書在高祖時已完成。現在書前所載序文，結銜署「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這些銜名應係追改或後人修改的，因為上項官職和爵號全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給予歐陽詢的，從《唐書》本傳、張懷瓘《書斷》卷三和《唐會要》六十四「弘文館」條核對下來，都是這樣。若為成書上奏時的原署字樣，就祇能說是成書已入太宗時代，這是和事實不符的。

《藝文類聚》凡分四十六部，《四庫全書總目》稱「為類四十有八」，《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又稱「凡分四十七門」。數字上的歧異，都由於對原書卷八十一（藥香草部上）和卷八十二（草部下）的計算法不同所致。《庫目》大約是把藥、香、草作為三部計。《燕大目》則明確以「藥香草部上」為一部，「草部下」為一部。我們覺得，既是標為「上」「下」，為與其他占多卷的各部計，還是應該用統一的標準作為一部。列子目七百二十七。全書約百餘萬言。所引用的古籍，據北京大學研究所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統計，共為一千四百三十一種。他們輯製了一個《類聚》引用書目，載《北京大學二十五週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臨時特刊》我們據以作了約略的分析，得知在這些被引用的文籍之中，現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可以證明《四庫全書總目》「三五所云『隋以前遺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的估計是接近實際的。這就是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為今所不傳之書；而其餘的不足百分之十的徵引，因其所援用者為唐前古本，例如：本書所引《左傳》，卷五有「昭上」之稱，卷三十五有「僖中」之稱，蓋當時傳本分卷與今不同，僖公、昭公有分卷為上、中、下者。可用以互校

今傳之本而有可能糾訂其誤繆。遠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華》，就已利用本書。至清代的校勘、輯佚學者治理先秦、兩漢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廣泛地運用這部類書而多能深切理解其價值。

公元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阮元撰寫《仿宋刻太平御覽叙》，有一節說：

「《太平御覽》一書，成於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籍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於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載鮑崇城刻本卷首，亦見《擘經室三集》卷五）

阮元的話，說準了一半，也說錯了一半：對的是《太平御覽》確實是保存了許多今天不傳的秦、漢古籍；錯的是，《御覽》所以能够徵引那些文籍，實際上并非純然由於「北宋初，古籍未亡」的緣故。那時候，凡是今天所不見的古籍，也有不少是已經佚失的了。《御覽》還能够加以引用，南宋的目錄學者陳振孫所早經闡明的乃是事實的真象：

「《太平御覽》一千卷，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家參譯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考之，館閣及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

卷本卷第四十六；二十二卷本卷十四，文字小異。）

《三朝國史》的《藝文志》是代表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家藏書的實際。陳振孫提出的這個證據，有力地說明了宋朝初年編《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古籍，不一定為當時確實存在的；而所以能够徵引的原因在於「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從今天來看，一件更為重要的事實是，那些「前諸家類書」，《修文御覽》和《文思博要》也都已失傳，《修文殿御覽》仍餘下敦煌唐寫本二百五十九行，然而是否確為《修文殿御覽》還有問題；《文思博要》祇餘下唐寫本第一百七十二那一卷。祇有《藝文類聚》歸然獨存。《類聚》的完整原貌雖然還有百分之幾存在問題，馮舒說：「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雜亂無緒。」陳揆認為這三卷「似有後人增入處，非率更原書」。還有其他的問題，見後《校序》。然遠非斷編殘簡的《修文》、《文思》之比。

《藝文類聚》在引書上，也比《太平御覽》為謹嚴，可以通過一個事例來說明它。《御覽》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云：

1《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為鐵室以備之。

2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

3又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4又曰：楚人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在今本《韓非子》中，有上述的第1、2兩事，分見於《內儲說上七術》及《十過》兩篇。但無第3、4兩事，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所附《逸文》據《御覽》以輯入之。今查「水激則旱」、「楚人有白猿」二事雖不見於今本《韓非子》，但見於今本《淮南子》。前一事在《說山篇》，後一事在《兵略篇》。根據這種情況，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判斷：（一）《淮南》襲《韓非》之語，故以《御覽》之引而可得《韓子》的逸文，並從而遡《淮南》之語源；（二）不是別的，而祇是《御覽》的引文安錯了頭。何者為是，本未易臆斷。然一檢《藝文類聚》，就好像在試管裏迅速地看到了化學反應一般，恍然於《御覽》在這個地方犯下了粗失的毛病，致貽後人以迷失途徑之誤。按《類聚》卷六十軍器部箭門云：

1《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

2《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阜……

3又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對照下來，上引《御覽》的第3條的「又曰」本應作「《淮南子》曰」，就是很清楚的事了。吳淑《事類賦》卷十三注引「楚王有白猿」事亦作「《韓子》曰」，而吳淑正是《太平御覽》的纂輯人之一，難道這是偶然的事嗎？

《藝文類聚》同它以前的類書或以後的大多數類書在輯存文獻的方法上有一個重大的不同之點，從而構成了它自己在類書群中的獨特之處，這就是把「事」與「文」兩條龍並成了一條龍，變更了類書的常規體制。以往，「文」自為總集，「事」自為類書，正如歐陽序文所說的：「《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略》，直書其事」；而其弊在於「文義既殊，尋檢難一」。歐陽創造的體制，則是事與文兼，「金箱玉印，比類相從。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他當時的目的，祇在於「俾夫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而對後世來說，却具有大量保存了自漢至隋的詞章名篇之功。陳振孫因稱之為：「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本卷第四十六；二十二卷本卷十四。高儒也說：「漢、魏、六朝之文，獨賴《文選》、此書之存。不然，幾至泯沒無聞矣。」（《百川書志》卷十一。故自晚明以下，馮惟訥輯《詩紀》，梅鼎祚輯《文紀》，張溥輯《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無不資以為寶山玉海。光聰譜《有不為齋隨筆·甲》：「婁東所輯，大率從《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古文苑》四書來。」迨清嘉道間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其取汲於本書的資料之多，幾乎達到了頂點。

由於時代的局限，《類聚》在類目結構上還存在着許多不足之處。《四庫全書總目》已經

對它提出批評，雖不一定說得都對，但也是值得參考的：

「其中門目，頗有繁簡失宜，分合未當。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瀆闕一；帝王部三國不錄蜀漢，北朝惟載高齊；儲官部公主附太子，而諸王別人職官；雜文部附紙、筆、硯，而武部外又別出刀、匕首等為軍器一門；道路宜人地部，壇宜人禮部，而列之居處，鍼宜人器物，錢宜人寶玉，而列之產業；案、几、杖、扇、塵尾、如意之類宜人器物，而列之服飾；疾病宜人入部，而列之方術；夢、魂魄亦宜人入部，而列之靈異；以及茱萸、黃連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鴻之外又別出鴈，蚌之外又別出蛤，鶴之外別出黃鶴，馬之外別出駒駝，如斯之類，皆不免叢脞少緒。」

《類聚》在引用資料方面，也多有欠慎以致誤的地方。當然，唐以前的古籍，有些情況常常不能用後來經過流變的古籍去等看待。但是有些問題，却無論從哪一角度來考察，也祇能得出相同的答案。舉例來說：《四庫全書總目》云：「王琳《野客叢書》摘其以《漢書》「長陵一抔土」事誤「抔」為「杯」，收入杯門。」說見《野客叢書》三十卷本卷第十七；十二卷本卷之七。但原文并不像《庫目》的引文肯定為《類聚》之誤。《庫目》的引語，其實走失了王琳的本意。但是作為《庫目》自己的意見來看，還是正確的。以「抔」為「杯」，唐初確有此一說，但在當時，也是一個「考之未真」的錯誤。顏師古注《漢書·張釋之傳》就交代得很清楚：

「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

王楙又指摘它在蒲門中載趙高束蒲為脯事謂出於《史記》，「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按，《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李善注引《風俗通》有此說。臧榮緒《晉書》嘗引以為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野客叢書》三十卷本卷第二十二，十二卷本卷之九。本來也可以懷疑《類聚》所引是否為《太史公書》的逸文，但王楙既見其說於臧書，今有湯球、黃奭、王仁俊、陶棟四家輯本臧榮緒《晉書》，皆無此事。然王楙生當南宋，猶及見之。則引《晉書》而誤標《史記》，事有可能。這就是說，不能保證《類聚》在引書上完全不犯「張冠李戴」的錯誤。

初唐文風，承前代積弊，依然是在形式上追求俳縵、駢偶，盡堆砌雕琢之能事；在內容上充滿了冥想、縱游和物欲，流於空虛頹唐。作為提供綴文資料的類書，當然擺不脫這種影響。於是《藝文類聚》雖然保存了許多的前代詞章，然而限於它的主要採擇標準，有些確實具有社會意義、歷史意義的作品，反不能入選。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第五、六世紀間兩次學術上大論戰的重要文獻——祖冲之為反對保守、維護科學原理而作的《辯戴法興難新曆》，范鎮為反對玄學、提倡唯物觀點而作的《神滅論》、《答難神滅論》等巨製，都不是依賴《藝文類聚》而保

存下來的；前者藉存於《宋書·曆志》，後者藉存於《梁書·儒林傳》及《弘明集》。聲律自然、內容比較健康、歷久傳誦的民間歌辭如《木蘭詩》，也不是依賴《藝文類聚》而保存下來的。它是被隋僧智匠輯入《古今樂錄》，經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五的引用而流傳下來的。

《類聚》中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但其中有一些資料，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來加以考察，對於我們今天還是有用的。例如：卷九十八有『木連理』一門，這些資料的本來面目，是封建幫閑分子假借事象，談說禎祥，給統治集團歌功頌德而留下的，肯定是糟粕。但我們若剥去它那封建迷信的外衣，從自然現象來看『木連理』，就知道這本來是植物生理上的一種稀見的、特殊的現象——自然接木（*natural grafting*），而為歷代人民所觀察發現的。如果我們把這一門目中輯存的資料作為自然接木的發現紀錄來看待，就能集中地得到公元一二四年延光（原誤延和）三年、一四八年建和二年、二二〇年魏文帝元年、二七七至二九一年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三一七年建武（原誤建元）元年、三一八年泰興元年的一堆材料，有助於說明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看到了自然接木的諸種現象，積累起來，就能進而掌握其特性，運用到農業生產上來，從而創造人工的接木——嫁接法，作為無性繁殖的手段。而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本門中所引用的袁山松《漢書》、《魏略》、干寶《晉紀》、《晉中興徵祥說》、湛方生《木連理頌》、晉范甯《為

豫章郡表》等，都是早已失傳的書文，也就是說，若非《類聚》之輯錄，我們現在就不能獲得這一堆資料。

從宋代以來，學人們在校理古籍、探索文獻的工作中，都曾廣泛地利用過《藝文類聚》。一般說來，他們所曾憑藉的是那些版本呢？據現在所知道的，南宋紹興時十二世紀中期浙江地區曾刊刻過這部類書。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七字、二十八字不等。《中國版刻圖錄》著錄。此後，明代有許多刻本：正德十年乙亥（一五一五）錫山華堅蘭雪堂銅活字本，每半葉十四行，行十三字。此本每半葉的直闌原祇七行，因每闌雙行排，故為十四行。《中國版刻圖錄》著錄。嘉靖六年丁亥（一五二七）天水胡纘宗在蘇州刊小字本，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嘉靖七年戊子（一五二八）陸采加跋本，即用胡刊小字版重印而加跋的本子。但版經剗改，字句也有不盡同於胡本處。在有些著錄中，也稱這個本子為「聞人詮刊本」，事實上聞人詮祇參加過這個本子的部分工作。詳見《郎園讀書志》卷六。嘉靖九年庚寅（一五三〇）宗文堂刊本，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這個版刻的流傳印本，往往被書賈割去跋語、紀年，以冒充嘉靖前的刻本。細審這個刻本的正書字體和刻書跋微有出入，因此也有一種假設，認為原刻時代當稍早（就其結體估計，當在弘、正時），迨嘉靖九年宗文堂得版，乃加跋重印。正書字體，絕似當時書戶劉洪慎獨齋所刻。傳本的慎獨齋所刻各書，多在正德年間，然下限有及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者。嘉靖二十八年乙酉（一五四九）知山西平陽府事洛陽張松重刻小字本，行款與胡刻本全同，惟前有濮陽蘇祐、莆田黃洪毗、益都鄭先溥序，末有張松的重刻後序。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王元貞在南京刊大字

本。也稱為「中字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前有長洲湯聘尹序，末有王元貞跋。幾個明刻本的優劣，據清季目錄校勘學者周星詒的評價說：「蘭雪本佳，聞人詮本次之，大字本最劣。」但據現在研究下來，還是胡刻本即所謂聞人詮本勝於蘭雪本。清代學者利用《藝文類聚》最為勤密，但是終有清一代，沒有認真地重刻過本書，祇是在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有成都宏達堂的一個刻本，《郎園讀書志》的著錄，誤宏達堂為明達堂。它是據明王元貞刻大字本翻雕的，恰恰這個底本是明刻中最壞的一個，而翻雕又加上了新的謬誤。這一代學者所使用的版本，祇是明代的幾種刻印本，宋紹興本幾乎沒有人看到而加以利用。在明季的崇禎十年（一六三七），校書家屠守老人（馮舒）借到一個宋刻本，據現在的瞭解，這個宋刻本與我們在一九五九年據以影印的宋紹興本是出於同一版子的印本。費了一百天的時間，細校在所謂聞人詮刊本（陸采本）之上。馮所借以校勘的宋刻本，旋即石沉大海，影踪全無。大約是毀於一六五〇年的火災。這個校宋本，在清代就成為《類聚》最好的本子，一些嚴謹的校勘學者，就鄭重地把它作為「代宋本」來應用，因而有不少的學人展轉過錄。例如：嘉慶時，陳揆；道光時，陳徵芝；同治時，譚獻。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七、《帶經堂書目》卷三、《復堂類集·日記》卷一。丁氏八千卷樓也有一個陳揆校本，實際上是臨錄陳校本，而對於馮校本來說，已屬於「孫」的一代。

《類聚》的舊刻本中，還沒有見到過元刻本，可能是這一代沒有刻過。近八十年間，學人們往往以為有一個元版宗文堂刻本存在，實際上它是前述的明版宗文堂刻本。所以被信為